

西学东渐与汉语词汇的演化探论*

徐 时仪**

汉语的历史悠久，使用区域广阔，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汉语与异质语言的接触可谓源远流长。据《礼记·王制》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言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又据张衡《东京赋》云：“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薛综注：“重舌谓晓夷狄语者。九译，九度译言始至中国者也。”《晋书·江统传》亦云：“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可见古时汉语与异质语言通过翻译而交往。自商周至今，汉语既有亲属语言间的接触，又有非亲属语言间的接触，即既有内部不同氏族不同方言的接触交流，又有外部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接触交流，具有南染吴越与北杂夷虏的特点。汉语与异质语言的接触中有交流和碰撞，也有交融和认同，汉语正是在与不同语言文化的接触中不断充实完善的，语体上则渐由文言转型为白话。

汉语与阿尔泰语言曾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接触，第一次接触是汉代与匈奴的交往，第二次是北魏时鲜卑族的入主中原，第三次是辽金元时期契丹和女真及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第四次是清代满族的入主中原。汉语与印欧语言也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接触，这三次接触又导致了汉语的两次欧化。第一次接触是西汉时张骞凿通西域，中西交通的经贸往来导致了西汉至唐代汉语与西域语言的接触，汉语中产生了“狮子、蒲桃”等一批外来词。第二次是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东传，汉魏至唐五代大规模的佛经汉译导致了汉语与梵语、犍陀罗语以及中亚的吐火罗语等语言的接触，形成了汉译佛典不同于文言的特有的句式，这可以说是汉语的第一次欧化。第三次即明清至民国的西学东渐，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冲击导致了汉语与欧美语言的大规模接触，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古白话的欧化白话，这可以说是汉语的第二次欧化。明清至民国西学东渐汉语与印欧语言则有三次具有一定规模的语言接触，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本文拟就西学东渐时的语言接触与汉语词汇的演化略作探讨。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Y044）；上海市教委085工程项目“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项目。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一、西学东渐时的语言接触

明万历末至天启、崇祯年间，西方大批耶稣会教士先后来华传教，同时讲学译书，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据统计，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知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金尼阁等七十多人，译著约有120种。¹⁾ 这些译著除少数由传教士自译，大多是由其口授或草译，再由中国士大夫转译或修改润色而成书。如《几何原本》即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撰述而成。利玛窦还著有《西字奇迹》，²⁾ 金尼阁则著有《西儒耳目志》。《西儒耳目志》分首谱、音韵谱和边正谱三册，采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行音素分析，开传统反切注音法转变为现代音素注音法的先声，且涉及中西文字的差别、音节与音素感知的差别、声韵和元辅区分的差别，提出了“元音”、“字父”等术语，讲解了有关拼音知识，指出“中华之字，同音极多，如衣、医、依一音也而有多字，西字止有衣 i 之一字，用之岂不乱哉！”认为西字表音，汉字象意，汉语不宜采用拼音文字，对汉语的特点有较深刻的认识。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指出：“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跟金尼阁的《西儒耳目志》在中国音韵学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后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1、用罗马字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作繁杂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2、用罗马字母注明字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遍音，仍可推知大概；3、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使当时的音韵学者如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受了很大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一步深入各地，一般民众成为主要对象。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翻译《圣经》，发行传教读物，宣传教义和西方文化，多采用白话，³⁾ 不仅词句俚俗，“其《圣经》与《赞美诗》，间有用本地土白译成的，如有所谓福州土白、广州土白、上海土白、宁波土白等类”，⁴⁾ 而且带有欧化的特点，尝试改造汉语，推动汉语的变革。正如裘廷梁1898年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所说：“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语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则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⁵⁾ 如果说东汉佛教东传，汉译佛经重在传真，切合经文的原意，而不重在辞藻文彩；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形成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梁启超认为“质言之，则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也。”⁶⁾ 那么这些西方传教士出于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传

1) 马祖毅《徐光启与科学翻译》，《翻译通讯》1980年第5期。

2) 《西字奇迹》是利玛窦用罗马字注音的文章，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编号Racc., Gen.Oriente, 231.12）。

3)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初期教会所译《圣经》，都注重于文言，但后来因为教友日愈众多，文言《圣经》只能供少数文人阅读，故由高深文言而变为浅近文言，再由浅近文言变为官话土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228页（1940年初版）。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219页（1940年初版）。

5)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无锡白话报》第1号，1898年。

6)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

教的需要，翻译的传教读本也力求语言通俗，多用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而翻译是把源语信息转化为目的语信息，由于语言的异质性，源语的某些语言特征必然会进入目的语语言体系，对目的语产生影响。传教士在翻译时或多或少会借鉴外来概念，创造一些新词汇，并且出于习惯也会采用一些欧化的句式，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汉语语法和表达方式的更新，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滥觞。⁷⁾

除了翻译读物，传教士编纂的英汉词典收录和诠释的外来词和新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汉语词汇的构成和句法形态的变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英汉词典不仅吸收了外来词和英语的一些语言要素，而且形成了一个能反映英语和白话文词汇词义间对应匹配关系的认知词库，构建了英语和汉语白话文之间的价值等值关系，为使用白话文翻译英语著作或其他英汉语言的交流接触活动提供了参考依据，规范了英汉语言间的对应关系，有效地统一了外来词的译名，促进了现代汉语思维的形成和现代词汇的有序发展。⁸⁾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有《华英字典》，共分三部。第一部中文名《字典》，分为三卷，第一卷1815年出版，第二卷1822年出版，第三卷1823年出版；第二部中文名《五车韵府》，分为二卷，第一卷1819年出版，第二卷1820年出版；第三部为一卷，英文译名《英华字典》，1822年出版。这部《华英字典》参照《康熙字典》的体例和内容框架，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工具书的编纂模式，有意识地将当时的西学知识与中国知识相对应地进行诠释，开创性地编纂成一部新型的中英双语字典，构建了一座中西方双向通行的知识桥梁。马礼逊以普及求知满足实用需求为宗旨，从学习者的需要着想，在汲取《康熙字典》代表的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打破了馆阁体的文风，用民间的白话替换了文言，大量选用宋、元、明的白话例句和当时的口语用法进行诠释，大大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如解释的白话词语有“意见、工夫、老实、天然的”等，例句有“大汉手持木棍也不做声照着苏友白劈头打来”、“他忙问王夫人早饭在那里摆”、“婆子道先前睡到安静这时节又醒来见神见鬼不知嘴里说些什么”、“只怕便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好生着急慌慌张张鬼赶着似的”、“你能活了多大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将百姓们合在一搭儿讲法律与他们听”等。又如《字典》释“一”的中文用法举例有“一般、一样、画一、一个人、一口水、一心、一总、一切、万一”等，《英华字典》释“一”的中文例句有“每一次拿出一个、一一扶起、个个着忙”等；《字典》释“天”的中文例句有“天大事我办得来、今天、明天、昨天、天天、天天在学堂读书、成天讲、天晚、天亮”等；《五车韵府》释“天”的中文例句有“天气好、天下一家”等；《英华字典》释“法”的中文例句有“犯法、把这个法律写出来悬挂在各城门上”等；《五车韵府》释“理”的中文例句有“普遍的理就如汪洋之水，每人各取一份，有人多些，有人少些，但仍有属于汪洋之水，汪洋之水是至高无上的”、

7) 周作人1920年所撰《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曾说到：“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版45页。

8) 参胡开宝《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理会知晓或充分理解事物的原理或本理”等；《英华字典》释“理”的中文例句有“道理、推论道理、拿理去和他讲、三人抬不动个理字”等。⁹⁾从马礼逊《华英字典》所举的例句亦可见当时的口语，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礼逊对“民主”、“自由”等一些西学知识概念已作有解释，如释 democracy 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释 freedom 为“自主之理”。又如“真理”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日语传来的新词，¹⁰⁾实际上马礼逊编的《五车韵府》中已有“真理 truth”。¹¹⁾

19世纪中后期一些留学生通过翻译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作品，在1890年到1919年间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产生了一种新的白话文”。¹²⁾这些西学译著和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创生、借鉴了外来的词汇和概念，而且还引进一些欧化的表达方式。这时期受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兴起，一些西方传教士或西方学者撰写了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如瓦罗的《华语官话文法》、马士曼的《中国言法》、艾约瑟的《中国上海土话文法》、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等。马建忠“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摹仿借鉴拉丁语法，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在1898年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阐释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汉语一直没有形成像印欧语系一些语言那样的成系统的语法学，人们主要采用“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方法，从熟读和背诵中的意会来体会词句的意义和写文章的方法。《马氏文通》则以拉丁语语法为蓝本构建了古代汉语的语法体系，建立了字、顿、读、句四级语法单位。全书在重视句读的基础上，区分字类、讨论词法，进而分析字的用法和位次，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共分十卷，卷一正名，提出了二十三种界说，分别为有关的字类、成分、位次、顿、读、句下了定义；卷二至卷九依次讨论字类（词类），其中卷二至卷六主要讨论实词，卷七至卷九讨论虚字以及各类字在句读中的作用；卷十专论句读，并对前九卷的内容加以总结和补充。马建忠认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实字分名字、代字、静字、动字和状字五类；虚字分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四类，并根据汉语的特点创立了“助字”一类；设立了起词、语词、止词、表词、加词、司词和转词七种句法成分，基本上奠定了汉语的句法分析体系和框架。

二、语言接触与词义演变

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其中不少新词“是由汉语古典词衍生而成的，历经了从古典义向现代义的转换，而外来概念对固有语的意义渗透和改铸，是导致这种转换的重要助

9) 参钟少华《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看词语交流建设》和《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与康熙字典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10) 参冯天瑜《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453页。

11) 马礼逊编《五车韵府》，澳门1819年版63页。

12)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上海书店1990年版。

力”。¹³⁾如“律师”一词本指精通音律的人。汉唐佛教东传，佛教又称熟知戒律能向人解说者为“律师”。唐代“律师”也是道士按修行程度而得的称号之一。随着西学东渐，“律师”一词可用来指传授法律知识的人。如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余谓此象可以为刑官，可以为律师。”后则专指受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出庭辩护，以及处理有关法律事物的专业人员。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就是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律师”一词的外来概念义对汉语原有意义的渗透和改铸成为专指从事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由此义又产生了与其相关的审判、陪审、当事人、辩护等词语，形成了一个诉讼和辩护等有关律师制度的词汇和词义系统。

在汉语原有词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古典翻新词大致有五种词义变化现象：

1、词义由原义变为新义，新义无歧义。如“几何”，原是疑问代词，后用为数学术语。又如“银行”，原指制造银器的行业。如《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我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后用来称通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任务的信用机构。1847年在上海开张的英商有利银行是我国第一家外资银行，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

2、词义由原义变为新义，新义本身有歧义。如“民主”，有由“群众的力量”义到“投票选出代表的权力”义的演变，含意复杂。¹⁴⁾又如“封建”由“封邦建国”义转指封建制度的社会形态或思想意识。¹⁵⁾

3、词义由原义变为新义，原义与新义大体相近。如宪，即法。同义并列组成复合词指法典，法度。《国语·晋语九》：“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西学东渐后指国家的根本法。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在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效力，是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又如“护照”原指因出差、旅行或运输货物等向主管机关领取的通行证。《清史稿·文宗纪》：“骆秉章奏贼中投出难民，给予免死护照，资遣回籍。”后用以译英语的passport，指证明出国公民身份的证件。清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德国天主教士若领有德国钦差公署所发护照，其应为保护及应沾利益之处应与法国教士领有法国钦差公署所发护照无异。”护照的远源可溯至春秋时代，湖北出土的“鄂君启节”上所刻铭文表明此是鄂君境内沿江水上下运转货物过关的通行证。汉代过关的通行证是木制的棨。《说文》：“棨，传信也。”《汉书·文帝纪》“除关无用传”唐颜师古注：“古者或用棨，或用缙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又称作“引”。明唐玉《翰府紫泥全书·托人给引》：“某欲他往，烦给一引，使奔四方关津处所得无留难。”《西游记》第五十四回：“请投馆驿注名上簿，待下官执名奏驾，验引放行。”“护照”一词最早见于林则徐写于道光

13)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525—526页。

14) 参拙文《“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内涵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5) 参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十九年十二月（1840年初）的奏报：“另由粤海关发给米利坚等国护照两张。”¹⁶⁾

4、词义由原义变为新义，原义对新义的理解有影响。如“权利”，汉语中最初是一个词组，指“权势”和“财货”。如《荀子·劝学》：“是故权利不能倾也。”引申而有“权衡利害”义，如《商君书·算地》：“权利则畏法而易苦。”后用来译西学中的法学术语rights，指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rights在英语中有个人的自主性，汉语原义的“权势”和“财货”义影响新义，使其带有“具有一定地位或履行一定义务才有资格”义。又如“卫生”，汉语中最初也是一个词组，指“保全生命”。如《庄子·庚桑楚》：“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郭象注：“防卫其生，令合道也。”引申而有“谋生存”义。如《宋书·郑鲜之传》：“至于陈平默顺避祸，以权济屈，皆是卫生免害，非为荣也。”后用来译西学中的hygiene，指预防疾病，引申又用以指合乎卫生的环境和措施。汉语原义的“保全生命”义影响新义，使其带有“有益于健康”义。¹⁷⁾

5、词义上原义对应的是新义的引申改造义。如“群众”，汉语中本指众人，民众，大众。如《荀子·劝学》：“群众不能移也。”后用来译西学中的masses，而masses本来也是一个表纯粹数量概念的词，有“一群人”义，后转换为表示“人民的力量”这一政治术语。又如冯天瑜《新语探源》说：“在中日频繁交往的当代，少量日本词语仍偶有传入中国的，如‘人气、料理、居酒屋、便当、卡拉OK、新登场’等日制名词，近年不时出现在中国的书刊乃至街头招牌上。”其中“料理”一词在日、韩语中指菜肴，语源也来自汉语，最初写作“撩理”，本义是“撩捋整理”。考唐释玄应《众经音义》卷十四释《四分律》第十三卷“撩理”载：“《通俗文》：理乱谓之撩理。又《说文》云：撩，理之也。谓撩捋整理也。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¹⁸⁾《通俗文》是一部专释俗语俗词的训诂学专著，书中所收的俗语俗词反映了汉代实际所用词语的面貌。此书今失传，据玄应所引，可知“撩理”是东汉已出现的俗语词。《说文》：“撩，理也。”北周庾信《梦入堂内》诗：“画眉千度拭，梳头百遍撩。”撩、理同义并列为复音词“撩理”而有玄应所说“撩捋整理”义，如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十二：“其坑当中留一土心。其土心上，以香汤和净牛粪泥作莲华座，必须加意精细撩理。”又如《玄应音义》卷十八释《解脱道论》第一卷装揅云：“今中国人谓撩理行具为缚揅。”“撩”后又写作“料”，即玄应所说“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故“撩理”后写作“料理”。如《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三·懊恼歌十二》：“发乱谁料理，托依言相思。”引申则有“照料、处理”义。如南唐史虚白《钓矶立谈》：“望其旄纛之所指，举欣欣然而相告曰：‘是庶几其撩理我也。’”亦可写作“料理”。如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五十：“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业，善经营，善持故。”由“照料、处理”义引申又有“制办、安排”义。如《齐民要术》卷三《蔓菁》：“其叶作菹者，料理如常

1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798页。

17) 参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223页。

18) 玄应《众经音义》又名《一切经音义》。今传本主要为碓砂藏、赵城金藏、丽藏本等释藏本和庄炘、钱坫等校刻本，各本皆略有不同，本文据丽藏本。

法。”“料理”一词沿用至今，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为“办理”、“处理”，如“料理家务”。据玄应《众经音义》的解释，可知其原本写作“撩理”。由于“撩”除了有“整理”义外，还有“掀起”、“挑逗”等义，随着“撩”的“掀起”、“挑逗”等义为人们所使用的频率渐大于其“整理”义，同时“料”由“估量”义亦引申而有了“审理”、“处理”义，发展至唐代“撩理”遂为“料理”所替代。其时诗词中往往将“撩理”的“挑逗”义也写作“料理”，如卢祖皋《谒金门》词：“做弄清明时序，料理春醒情绪。”词意为春醒情绪所撩惹。又如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诗意谓未须逗弄白头人。¹⁹⁾“料理”的“撩理整理”和“照料、处理”义中含有“整治加工”义，而吃是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做菜和烹饪之前也必须对饭菜的原材料作一番洗涤切削的整治加工，故可引申而指烹饪前的整治加工。如唐义净译《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二：“舅买一兔，使令料理：‘我暂洗浴，即来当食。’彼料理已，舅未至间，便食一脚。舅洗浴回，问其外甥：‘料理竟不？’答曰：‘已了。’舅曰：‘料理既竟，将来我看。’”因烹饪加工的对象是饭菜，故又由烹饪前整治加工的动词义再进一步引申而特指烹饪好的菜肴。“料理”一词先由日语借用，后成为日语中的常用词。日语用“料理”一词表“顺利地处理事情”义，又由此义引申发展有“做菜、烹饪”和“菜肴”义，韩语中“料理”一词的“菜肴”义则间接地借用日语，然其源则皆可溯自汉语。

这五类词义的变化现象或有交叉，有些词的词义变化较为复杂。如“革命”一词的词义变化就兼属第二类和第四类，其新义本身就有“渐进变革”和“暴力颠覆”意义上的不同，原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卦·彖》）的“以暴力改朝换代”义对“革命”新义的理解也有一定影响。

有些词的词义原本不同，在对应西学术语时则表示同一新义。如“人文”原指礼乐教化。《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后泛指各种文化现象。孙中山《民权初步自序》：“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之国家者，其故何也？”“人道”指为人之道。指一定社会中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引申可指社会的伦理等级关系。《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后指爱护人的生命，关心人的命运，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苏州河桥头的战争》：“有些先生为了制止屠杀、劫掠、毁坏，进行了很人道的干涉。”胡适《读〈北史〉杂记》：“这个制度虽是惨酷不人道，然而其中涵义正是惧怕女后权大。”“人本”在近代有人人平等的意思，现又有“以人为本”的意思，这与古代“民为邦本”的“民本”似有联系却有本质的区别。“民为邦本”意谓统治者要清楚民众是自己维持统治的基础，“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一切为

19) 郭在贻《古代汉语词义札记（二）》一文指出此诗中的“料理”应是做弄、戏侮之意，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训为安排、帮助，欠妥。（《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

了人，一切依靠人。“人文”、“人道”、“人本”三词的词义不同，而 humanism 译作“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

还有一些词语所表的事物在西学东渐前已出现，西学东渐后改用相近的词语表示。如“邮局”、“邮政”和“邮政局”是办理邮政业务的机构，在清廷档案的《海防档》中有“拨驷达”一词，即 post office 的音译。明代曾有私人经营的民信局，以投递信件、包裹，办理汇兑等为主要业务。1878（光绪四年）中国海关税务始开办海关邮政，1896年正式设置邮政，取代了民信局。如清王鹏运《彊邨词序》：“前上书之次日，邮局即将《东塾读书记》、《无邪堂答问》各书交来。”后又增有电话和电报等电信通讯业务，称为“邮电局”。

三、语言接触与概念术语

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随着西学的东渐，源自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成分大规模引进，形成了具有欧化倾向的汉语新的词汇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19世纪以来，北京官话取代了南京官话，言文一致初见端倪，开始致力于获得一套表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术语等一系列大变化，尤其是作为近代国家语言的‘国语’的确立提上了日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音、语法、词汇都发生了跨系统的变化。”²⁰⁾从词汇系统看，增加了大量源于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的有关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上的概念术语。如“伦理”，原指事物的条理，引申指人伦物理，进而又指人伦道德之理、人际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人伦的理法。如汉贾谊《新书·时变》：“商君违理义，弃伦理。”《朱子语类》卷七十二：“正家之道在於正伦理，笃恩义。”后以“伦理”为基础组成“伦理学”这一反映西学 ethics 的学科名词，指西学中研究道德的起源和发展、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相互间和人们对社会国家等的义务的科学。“伦理”原有的“人伦道德之理”义对“伦理学”这一西学学科名词新义的理解有影响。又如“政治”原指政事得以治理。如《书·毕命》：“道洽政治，泽润生命。”孔安国传：“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政”和“治”组成“政治”一词，指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如《汉书·京房传》：“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诬误诸侯王。”清戴名世《史论》：“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于胸中，而后执笔操简，发凡起例，定为一书。”西学东渐时用来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又由“政治”为基础组成“政治学”这一反映西学 politics 的学科名词，指西学中研究国家学说、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史的科学。

就语言学而言，随着西学的东渐，也产生了音素、元音、辅音等一批新的术语。如“音素”指语音中最小的单位。依据音节里的发音动作来分析，一个动作构成一个音素。音素分为元音、辅音两大类。“元音”原指纯正而完美的声音。金尼阁《西儒耳目志》已提到“元音”这个术语，

20)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16页。

指出“元音，人声之自然也”。“元音”后成为语言学学术语，指声带颤动，气流在口腔的通道上不受阻碍而发出的声音。如普通话语音的 a、o、e、i、u 等。辅音则指发音时气流通路有阻碍的音，如普通话语音的 b，t，s，m，l 等。音素、元音、辅音等术语构成了承音韵学发展而成的语音学这门新学科。

这些学术词语往往一词多译。如 morpheme 最早译作“形素”，后又译作“词素”或“语素”，《现代汉语词典》释“语素”为“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释“词素”为“词的构成成分，是在意义上不能再分析的语言单位，词根、前缀、后缀都是词素。”²¹⁾ 学术界往往混用这两个术语，究竟是译作“词素”适合汉语还是译作“语素”适合汉语？汉语中本没有“词素”和“语素”这两个术语，而有“字”这个术语，“字”的概念和“词”的概念又有异同。又如 grammar，日语译为“文典”，后又译为“文法”。汉语中“文典”指文籍典册。“文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例中“文法”指规则法律。后用以泛指语文的一般规律和作文造句之法，至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始用以指语言的组词造句规律。蔡元培《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指出：“中国人本来不大讲文法，古文的文法，就是《马氏文通》一部。”至于“语法”一词，最早见于东晋后秦时期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卷四十四：“天竺语法，众字和合成语，众语和合成句。”例中的“语法”是梵文 Vya`karan`a 的意译，音译为“毗耶羯刺謏”或“毗何羯喇拏”。高名凯《语法理论》说：“印度人称语法为 Vya`karan`a，意思是‘分离，分析’，即对语言的各种语法形式加以分离或分析。”唐代孔颖达注《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年“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云“语法，两人交互乃得称‘相’。”例中的“语法”指用语的方法、文理。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用“葛郎玛”音译印欧语 grammaire（法）或 grammar（英）为“葛郎玛”，²²⁾ 意译即“文法”或“语法”，指语言的结构方式，包括词的构成和变化、词组和句子的组织。²³⁾ 现多用“语法”。“词素”、“语素”和“语法”等术语词汇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则促成了词汇学和语法学这两门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建立。

语言接触中每一个新概念术语的创生及其进入词汇，必然要在原有的表述系统中寻找位置，建立关系，对整个表述系统产生张力，从而影响或改变原有表述系统的内部结构与表述功能。这些概念术语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学东渐带来的新知识，不仅更新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而且或多或少对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思维的诱导性和价值倾向性。如有关地理概念的亚洲、欧洲、美洲等词的流行，影响着人们以这些空间为单位的地理名词来考虑问题，进行亚洲、欧洲、美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考和论述。又如世纪、上古、中古、冰期等词

21)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22) 《马氏文通》例言。

23) 陈望道撰有《“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文汇报》1960年11月25日，又载《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587—598页。

的流行，影响着人们以这些时间概念名词来考虑问题，划分时间段，进行纪年。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词的流行，更影响着人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按照这些范畴进行分类加以考虑。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渐至习而不察，奉为天经地义，²⁴⁾足见这些西学概念术语影响我们思维的巨大²⁵⁾。

四、语言接触与文化的交融

语言是知识的载体，西学东渐促进了汉语词汇的转化，汉语词汇的转化又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革轨迹和吸纳新知新学的过程。西学东渐产生的新词新义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又是西方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者。这些新词新义尤其是概念术语不仅反映了汉语词汇古今的发展演化，而且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层面反映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过程。

物质层面的词语如“幻灯机”，英语原称magic lantern，后改称projector，曾译作灯影镜、影戏灯。英国医生德贞（John Dudgeon）《中西见闻录》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介绍说：“夫灯影镜者，有类于显微镜，而必藉灯光之影射，始能观物，故名。”同治五年（1866年）斌春率同文馆诸生游访欧洲，学生张德彝所撰《航海述奇》亦有介绍。据《格致汇编》附刊光绪二年（1876）上海福利洋行广告载有影戏灯的图，告白说：“近有格致器具数件，系西国各行家所造，其工料格外精致，其价亦公道。如大远镜合于天文学各事之用，无论行星、恒星，其寻常须查阅之事，俱能显明如地面。最远之物，观之如近在咫尺。又有影戏最大之灯如上图，并灯中所用之天文、山水、人物等画甚多，合于戏园或大堂内演影戏之用。又有更小影戏灯若干，俱有出售。”又如“火轮船”、“火轮车”、“照像机”、“抽水马桶”等。这些词语反映了物质文明对人们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影响，推动了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精神层面的词语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从这些词语的演变可见观念的变迁。如称谓词语中“先生”本用以称年长有学问的人。《孟子·告子下》：“宋慳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赵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燕坐，谓三先生曰：‘愿闻先生有以补之阙者。’”姚宏注：“先生，长老，先己以生者也。”又用以称老师。《礼记·玉藻》：“（童子）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孔颖达疏：“先生，师也。”还可用作文人学者的通称。可自称，亦可称人。《史记·三代世表补》：“张夫子问褚先生。”司马贞索隐：“褚先生名少孙。”此为褚少孙自称先生。《文选·皇甫谧〈三都赋序〉》：“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李善注：“谧自序曰：‘始志乎学而自号玄晏先生’”

24)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25) 西学东渐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带来种种潜在的弊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以“机构化”、“国际化”、“标准化”、“数字化”为特征的话语体系已构成了中国社会管理的一种支配性语言，这种理念正以不容挑战和无需论证的假设及隐喻规定着日常管理方式。如我们把考试数字化，让学生在应试游戏中窒息基本的思考能力；我们把学术标准化，按照数字的定量来定性一流的高校和学者。

……先生，学人之通称也。”由此引申也可用以妻子称自己丈夫。汉刘向《列女传·楚于陵妻》：“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西学东渐后受Mr.和Sir的影响，可用作一般人之间的通称。古代用“夫人”称王侯和官员之妻，后用作对已婚妇女的尊称。汉赵晔《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适会女子击绵于濂水之上，管中有饭，子胥遇之，谓曰：‘夫人，可得一餐乎？’”西学东渐后受Mrs.和madame的影响，可用作对自己及他人妻子的尊称。古代官员之妻又可称作太太，后用作对长辈妇女的尊称。西学东渐后可用对已婚妇女的尊称，又可用以称某人的妻子或丈夫对人称自己的妻子。“夫人”和“太太”用以称某人的妻子或丈夫对人称自己的妻子反映了西学东渐后男女平等意识的启蒙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又如“博士”本指博通古今的人。《战国策·赵策三》：“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后成为学官名，又可用作具有某种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尊称。西学东渐后成为学位名，称学位的最高一级。再如“恋爱”本指爱恋；留恋。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四《安置部》：“恋爱资财，染著眷属。”西学东渐后特指男女相爱。如叶圣陶《线下》：“没有恋爱的结婚就是牢狱，活生生的一男一女就是倒楣的囚徒。”“情爱”指亲爱或友爱之情，又特指男女间的爱情。如《宋书·后妃传·前废帝何皇后》：“公主与瑀情爱隆密。”“爱情”指爱的感情，后也特指男女相恋的感情。如巴金《家》六：“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接吻”指亲嘴，多表示男女间的爱恋。如巴金《家》二六：“她觉得他的接吻还在她的唇上燃烧。”“恋爱”、“爱情”和“接吻”等词表达的男女间爱恋的社会现象古今是相同的，只是古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代以自由恋爱为主，从这些词语可见西学东渐后男女相爱的感情渐趋开放的婚恋观。

人类知识的拓展和语言的建构通常是同步进行的，知识的拓展首先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并凝结在语言中，反过来，凝结了先进知识的语言又是人类进一步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和交汇时，西学的知识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延伸开来，尤其是在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工程、机械等自然科学诸领域有了较大的拓展，形成一个以科学和逻辑为骨架，以大量经过严密分析的概念和语汇建构起来的理性知识网络。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精密，接受和掌握这些知识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个人作为“现代人”的必要条件。就现代语言哲学的角度而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媒介，而且也是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人们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就会不由自主地接受这个语言系统所拥有的价值观。具体而言，词是事物的名称，又是概念的符号和思想的载体。如果引进或创造了一种新的事物，通常也就要或先或后地引进与创造一个指称该事物的新词；如果引进或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一般也要随之引进或创造一个表达该概念的新词；如果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或思想理论，则更

是必然要随之产生一系列表述该种社会现象或思想理论的新词语。汉语在接受了西学中大量新概念和新词汇后，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知识领域的扩大，对世界的认识更精密，²⁶⁾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些新概念和新词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学中一系列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刷新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语言接触的深层次是思想接触，大量系统反映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西学新词，尤其是表现观念性的人文社科抽象名词，携带着新鲜的文化信息，丰富了汉语的概念系统和观念系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和科学思维能力，更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形成了构筑新时代突破传统范式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如“科学”一词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新词，而且是人们认识世界、社会和人自身的某种准则和精神内核，从意识深处改变了原有的子曰诗云的传统思维结构和方式。又如“革命”一词由《周易·革卦》的“汤武革命”到现代意义的“革命”就更不仅是对此词词义的理解，而且涉及到社会发展的途径，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²⁷⁾ 十九世纪末人们讨论的一些新概念新思想如“民主”、“民权”、“君主政体”、“立宪政体”、“国家”等，不断地为现代汉语所接受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新成分，正是像“宪法、国会、议会、政党、选举、权限、民权、自由、法律”等新词语替代了“皇帝、太监、龙廷、后宫、诏书、奏折”等旧词语，正是“科学”、“民主”、“人权”、“社会”等这样一大批有关文化与社会的西学术语关键词融入汉语词汇系统，²⁸⁾ 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功能系统，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语言体系，形成一种新的话语生态，在古白话的基础上融入欧化成分成为一种新白话，从而促使白话取代了文言话语的文化范型，导致了汉语文白顺应时代变革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²⁹⁾

五、结语

语言接触是语言相互影响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起因，语言接触可以深入到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异可以涉及到语音、词汇和语法，而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则决定了语言接触的深度，即决定了一种语言受另一种语言影响（干扰和借贷）的方向。因而五四时期汉语文白的转型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涉及到社会的

26) 如汉语词汇系统中原本有的常用名词“电”，其基本意义是《说文解字》所说的“阴阳激耀”，亦即“闪电”，西学东渐时用来对译英语的“electricity”一词，后又涌现出“电气”、“电路”、“电灯”、“电信”、“电机”、“电学”等一批新词，人们对“电”的认识在“闪电”义上又增加为指称“有电荷存在与电荷变化的现象”，扩大了人们原来有关“电”的知识而具有新颖的科学精神。

27) 梁启超曾撰《释革》一文，沿日文之波讨英文之源，从英文的reform和revolution的辨析中，以“变革”和“改革”取代从日文借用来的“革命”一词。此词涵义的不同理解不仅是语言学上的词义训释，而且更是社会政治学上的理论阐释，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详参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和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

28) 详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9) 参拙文《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多方面，其中也涉及到语言的接触，尤其是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印欧语言与汉语的剧烈碰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语的文白转型。徐世璇《语言接触性衰变的阶段性和质变标志》一文指出：“语言接触对各种具体语言的影响可能导致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相接触的两种语言互相影响、各自从对方吸收新的成分进一步充实发展。从其他语言中补充进有效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手段，是语言系统及时更新、不断丰富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助于语言内涵逐步深化，结构系统更加扩展，社会交际功能进一步增强，从而保证语言不断适应随时发展的社会交际的需求。另一种是相接触的两种语言实力不均衡，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制约下逐渐衰退。”³⁰⁾ 汉语的文白转型可以说是在印欧语言的剧烈冲击下汉语语言系统的及时更新，标志着汉语新书面语系统的形成，具备了吸纳西学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能力，适应了表达现代思想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为构建现代汉语奠定了基础。汉语语言系统的更新不单纯是以增加新词汇和新句法为标志的外在形式的演变，更是把新概念和新词汇所体现的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融入汉语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之中。这是汉语语言系统内蕴的生机所在，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所在。³¹⁾

西学东渐的语言接触促成了近代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词汇的转变，不仅词汇系统中增加了大量新概念新词语，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欧化的语言现象。这些欧化现象有来自传教士翻译时的母语习惯，也有中土文人无意或有意地摹仿借鉴。³²⁾ 从词法系统看，主要是复音词数量剧增，有把外来词翻译成并列双音节词的，如“consider考虑”，“action行为”等；有词组词汇化的，如“animal动物”、“truth真理”等。就词的构成而言，出现了用法跟英语“counter-, anti-”相当的前缀“反”（如“反革命、反宣传”），跟“-ism”相当的后缀“主义”（如“资本主义、浪漫主义”），跟“-ty, -cy, -ship, -hood, -ness”相当的“性”（如“纪律性、重要性”），跟“-ize, -ise”相当的“化”（如“现代化、欧化”）。就词的形态变化方面而言，结构助词“的、地、得”要明确分工，依次作定语、状语和补语的语法形式标志；动态助词“了、着、过”黏附在动词后面类似英语表示时态般的表示动态；人称复数助词“们”如“-s, -es, -ies”等黏附在指人或非人的名词或代词（“我、你、他、它”）后面表示复数；跟英语“and”相当的连词“和”使用渐多，“在……”（相当于“in, on, at”等）、“当……的时候”（相当于“when, while”等）、“关于、对于”（相当于“about, with regard to, in connection with, with related to”等）也大量使用。就词的组合同方面而言，结构趋于复杂。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语性结构共同支配一个对象、动词前面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助动词等。如“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爱过和正在爱着”，“已经证明并必将继续证明”等。从句法系统看，主语、判断词

30) 徐世璇《语言接触性衰变的阶段性和质变标志》，《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31) 参拙文《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2)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认为理想的白话文是“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模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新潮》1919年第1卷第2号。

的增加，并列成分、并行结构、插语补足语的频繁运用，既出现了句子结构延长和关系复杂化，也造成了句子结构的简练化；复句出现了偏句后置，表示被动的“被”字句也普遍使用，且还可用于褒义。

因而我们可以说，明清至民国汉语与印欧语言的接触已开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先声，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产生五四白话文的基础，推动了古白话演变为现代汉语的进程，导致了文白此消彼长的量变到质变。现代汉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传教士的作品中已具雏形，为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六、余论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具有社会交际职能。语言中词的产生是建立在大量的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对这些认识成果的凝结，体现和标志着有关的认识成果，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事物的认识状况。事实上词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能够作为它所指称的对象的符号，就在于体现了经验事实，凝结了人们的认识成果。这也就是语言能够影响思维并在思维中发挥作用的原因。语言的词义系统实际上是整个客观世界与人类主观精神凝结的体系，具有反映外界客观事物的功能。赵元任曾说“对于语言及其意义的各种研究路子是互相补充的。如果我们希望做到严谨、明晰，并且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很肯定，那么我们能说的就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希望谈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并且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那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不仅在真实性方面不那么肯定，而且在内容方面也许更不那么清楚。”“也许语言学家的日常工作总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一边是非常严谨的语义学方法，另一边则是对说话的人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研究。人作为说话的有机体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在语言学家中间近来有一种趋势，就是偏重研究语言现象中的更省力、更整齐、更清晰、更正规的方面，而把更有意义的和更具体的东西丢在一边。我大概就是这大多数语言学家中的一员，因为我的工作有95%是形式语言学，也就是说，对语言材料进行枯燥的描述，而只有5%涉及那有血有肉、更富意义和更人性化的方面。”指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努力，试着解读我们的编码”，期望“所有学科间的充分的相互理解”。³³⁾ 汉语的文白转型是上世纪初汉语的重大变动，文白的转型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秦汉以来白话中的口语成分发展至清末民初，时代的变革促使文白的替代突破量变而完成了质变。文白的转型自有其必然规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一切变化和发展不会是偶然的，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大致而言，汉语自身发展的趋势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导致了汉语文白的转型，而语言接触尤其是西学东渐时期的语言接触也促成了汉语的文白转型。

语言的发展具有渐变性和参差性。渐变性就是语言结构系统只能按照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逐渐

33) 赵元任《语言的意义及其获取》，第十届控制论会议论文集《控制论——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和反馈机制》，纽约：1955年。李芸、王强军译，《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4期。

地变化，采取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方式。参差性是指语言结构系统的各要素发展的快慢不一。就语言发展的渐变性而言，汉语文白转型的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在文言和白话此消彼长而又融合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参差性而言，文白的转型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西学东渐时大量反映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外来词的引进和创造使词汇体系首先发生了质变。³⁴⁾ 语言反映社会的变化，又反过来左右和支配社会的变化。词汇系统的更新导致概念系统的更新，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取代了传统的忠孝贞节等正统儒家观念，进而导致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渐悟到顿悟，引发了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新旧交替，从而形成了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看上去好似一人振臂高呼万众群起响应的突变式质变。五四时期白话取代言言的变革虽然在表面上是废弃了文言文这样一种书面语系统，但在话语生态的意义上，文言文所赖以生存的原有话语生态不可能被完全废弃，而是变成了白话文话语生态的一部分，且通过文化传承和教育的方式内在地影响着人们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乃至思维、认知和话语方式。文言文中的经典诗文、成语、名句和一些经典人物形象及史实融入了白话文中，从而使白话文在言文一致的发展中具有古今传承的纵深感。从现代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言与白话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来源和不同性质的成分混杂在一起，其中包括汉语原有的与外来的成分的并存，本质上已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既不同于古代汉语又不同于西方语言，而是在古白话基础上承文言的隽永凝炼，同时与时俱进，汲纳欧化语言成分，特别是思想词汇，成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新白话。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训诂学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说到：“倒是有一种笔者不解的现象，就是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家们，这些多数接受过西方语言学训练的专家，他们确实是继承清代考据学风，继承威妥玛的研究，继承《马氏文通》的研究，在中文语言、字形、古字流变、方言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中文字义内涵（特别是新词语的内涵），对于中外文字内涵的交流则研究得远远不足，连资料的收集整理都很少。中国人想让中国字表现得更准确清晰，就非研究词语的字义内涵不可。”³⁵⁾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也指出：“近代新词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相当一部分现代汉语词汇的‘来龙去脉’。但是同时，近代新词研究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汇史研究的范围。”近代新词研究“既有概念史，即导入外来新概念的历史的一面，也有词汇史，即新词形成的历史的一面。”³⁶⁾ 语言的接触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³⁷⁾ 不同语言中的词翻译时不一定有对等的词来表达，有一些词可能本身就存在不同理解上的歧义，况且每种语言都有自身的特点。汉语也同样如此。如上文提到的 morpheme 译

34)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后记：“语言是按照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变化的，其基本动因是时代、社会的要求和语言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同时，政治等外力的作用也是强大的，足以一时、甚至永久地扭曲语言。”中华书局2010年版554页。

35) 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11页。

36)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5—6页。

37) 如同成年人学外语难免带有自己母语的一些成分，而为了交际的需要，说不同语言的人交谈时在语言的有些方面彼此都会作些迁就和让步，包涵和容忍一些，造成词意上或多或少的模糊性。

作“形素”、“词素”或“语素”，不仅涉及内涵的理解，而且还涉及汉语自身的特点。又如对“语文学”和“语言学”内涵的理解。“语文”一词似由“言语文学”演变缩略而成，言语、文学最初是两类范畴。如《论语》卷六《先进》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据门人所长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言语文学”后又指言辞和文章。如宋曾巩《辞中书舍人状》：“择当世聪明隽工于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敷扬演畅，被于简册，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现代汉语中则指语言和文字，又可指语言和文学。“中国语文”即“中国语言文字”或“中国语言文学”，特指汉语言文字或汉语言文学，省称为“中文”。“语言”一词是由“语”和“言”组成的并列合成词，可指“言语、话”，也可指书面语，还可指说话、交谈。后用作术语，用以称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西学东渐，汉语受印欧语构词法的影响，出现了“~式”、“~感”、“~作用”、“~主义”、“~学”、“~家”、“~业”等具有概念归类的词缀，构成了一批新词语。“语文”和“语言”后加词缀“学”组成的“语文学”和“语言学”也是西学东渐后产生的新词，表示“学科”的概念。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说：“语言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学专指19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理论，广义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而现代语言学却以研究近代、现代语言和口语为主，兼顾其他方面。”³⁸⁾又据《辞海》释“语文学”为：“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的总称。西方一般认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建立于19世纪初，而把在这以前缺乏系统的语言文字研究称为语文学，亦有用它统称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在我国也有人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为语文学。现在一般将语文学作为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广义的语文学有时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释“语言学”为：“研究语言的科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此前的语言研究，在中国称‘小学’，在欧洲称‘语文学’。从史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应列入语言学。”³⁹⁾而西学中还有不同的说法。如英国学者罗·亨·罗宾斯说：“按照最狭义的解释，语言学的中心领域是对语言的形式分析和描写。只要语言学家扩大其学科范围而从事意义的研究，就可以说是接近了语文学的研究领域。”⁴⁰⁾俄文版的《语言学大百科词典》说：“语文学是通过对面文本语言和风格的分析来研究人的精神文化的诸多学科——语言学、文艺学、文本学、史科学、古文字学等的总合学科……语文学在关注于文本并为文本做辅助性的注释的同时（这是语文学工作最古老的形式与古典的原型），从这一视角把人的存在首先是精神存在的全部广泛深入的内容均纳入自己的视野。因此，语文学的内部结构是具有两极的：一极是不允许脱离文本具体内容的附属于文本的最低的服务；另一极是界限无法预先划定的广大博深性。”⁴¹⁾辩证唯物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体现了事物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语言

3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

39) 《辞海》，《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2325页。

40)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1) Волщ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чь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学的发展也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和完善过程。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由于我国传统的文献往往文史哲兼容并包，如《左传》既是经学著作又是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国语》、《战国策》等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因而传统语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兼容的体系，不仅包括语言学，而且旁及其他各个学科。传统语文学的研究由经学的附庸而转型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也将以新世纪新的当代意识，传承发明传统语文学研究的多元兼容特点，关注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而有科学的创新，变革为既力求科学地阐明汉语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之所以然，又关注人文社会的当代语文学研究，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上升至更高一个层次的多元兼容的当代语文学。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由“不允许脱离文本具体内容的附属于文本的”传统语文学到“界限无法预先划定的广大博深性”新时代语文学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新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王士元曾指出：“语言是人类最复杂最广泛的一种现象，单从一个角度一个学科去看是太狭窄了。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历史、跟人群分布联系起来。”⁴²⁾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也指出：“新词研究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⁴³⁾ 汉语在西学东渐语言接触中的欧化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且促成了文白的转型，触及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等方方面面。这些年来我们正越来越习惯使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学科渐趋于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等同，⁴⁴⁾ 剥离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而“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是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兴趣所在。”⁴⁵⁾ 人们创制或者引入某些词语都与人的生存需求和精神追求密切相关。因而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描写语言结构的本身，还应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和语言隐含的价值观念着眼，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要联系社会、物理、生理、心理把语言现象置于空间和时间中去描写和解释，涉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各个方面。研究西学东渐时期汉语的文白转型和词汇演化也同样如此。由此入手就能“明其理而得其法”，看到汉语适应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和趋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就能在传承传统小学的基础上有更多更实在的建立在实学所获实证基础上的创新。⁴⁶⁾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 译文引自郑述谱《“语文学”求解》，载《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6-47页。

42) 石锋《访王士元教授》，《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43)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6页。

44) 王士元《演化论与中国语言学》一文指出：“近年来有些形式语言学家硬要把语法当做一套像代数的系统来研究，这就不免有些削足适履。有时候甚至把一些很简单的句子分析得非常抽象和复杂。”《南开语言学刊》2008年第2期。

45) F. R. Palmer: Semantics, cup, 1982, P.21.

46) 详参拙文《略论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